

一个焦躁者的“恐怖犯罪”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8日晚,厦门市政府确认导致至少47人丧生的BRT公交车火灾系纵火,犯罪嫌疑人陈水总被当场烧死:“陈水总,厦门本地人,1954年生,经警方深入、细致地侦查和技术比对,并在其家中查获遗书,证实陈水总因自感生活不如意,悲观厌世,而泄愤纵火。”

“泄愤”在8日上午陈水总的微博中被发掘出来后,成为舆论共识。

根据“草民陈水总”的自白,距离6月7日爆炸案前90天,想办理退休的他,因年龄错登,社保不予办理,找公安改错又到处踢皮球。这些新近挫折让他一次次绝望,以致拎起汽油报复社会。

其遭遇令人同情,求助无门,最后同归于尽,但在拉上“无辜平民垫背”时,其行为超越了伦理底线。

民众为陈水总打上了“反社会人格”的标签,觉得他的这种行为已带有“恐怖主义”性质。

家的事知之甚少,但陈水总多次上访的遭遇邻居们却有耳闻,“来往于政府部门之间,问题得不到解决。”也许办个社保对他很重要,但没人觉得这是天大的事。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人生最后的行动令所有邻居都感到意外和震惊。

李云龙说,“从他最终选了乘客最多的公交进行作案,可见他只为杀更多的人。陈水总这种类型的人是弱势群体,他们面向更弱势的群体来泄愤。在实施爆炸时,可能内心得到满足,并有快感,认为完成了自己的生命价值。”

最好的防线是内心

实际上,同样处境的人很多,比陈水总惨的更不会少,他的遭遇并不能支持他这场反社会的杀戮。

每个社会都有弱势群体。剑桥大学社会学博士胡扬认为,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促进了阶层分化,如果这种分化是在市场秩序尚未完全形成,法律调控机制、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发生,就会使自认为得不到社会公平竞争的部分人产生焦虑。如果这种社会焦虑长期得不到解决或发泄,很可能就出现不理性行为,“比如爆炸案的发生。”

李云龙认为,虽然陈水总是极端个例,但由于中国人口多,这种问题和现象不容忽视。一些社会矛盾若长期得不到解决,很可能就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

不过,“当下贫困、窘迫,但对未来仍有期望的人,是不大会有失范行为的。我们应该让其看到希望。”胡扬表示。

对于陈水总这样的上访者,李云龙认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听取他们的诉求,并对问题积极进行解决。无论如何强调陈水总“悲观厌世”,当地政府都不能忽略他所遇到的诸种困境。

对于陈水总的自我封闭,周围人也应该进行劝导。“人们愈是脱离整个社会,就更容易违背社会准则和法律。”胡扬说,这需要社区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人员相助,“不然他们本身是弱者,可能会伤害更弱的群体,再次酿成悲剧。”

“最好的防线应该来自人们的内心。”胡扬认为,目前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急需一个舒缓压力的渠道。然而,在中国,看心理医生似乎还是可有可无。没有建起一道可靠的心理防线,一个人的焦虑便很容易变成整个社会的恐怖。

然而这种对社会的反思,终究不能超越大是大非的底线,也不能混淆罪与非罪的区别。李云龙强调,“不能同情犯罪者,这是对社会具有破坏力的爆炸事件,犯罪者理应受到惩罚。”



陈水总的家在逼仄的局口街,附近就是厦门的繁华商业街中山路。 本报特派记者 吴金彪 摄

“恐怖”无处设防?

“突然看到右后方有火光,感觉很热,再转过头,只见一个人烧了起来,紧接着有人放声喊。”20岁的陈辉(化名)回忆,起火来得突然,许多人没反应过来。

陈辉第一个跑出去,但至今还深深地自责。“事发当晚一直做噩梦,满脑子都是那些无助痛苦的面孔。”

类似的爆炸袭击案件,数不胜数。1998年情人节武汉长江大桥爆炸事件,2001年靳如超石家庄爆炸案,2003年黄翔北大清华爆炸案……其攻击对象都是普通公众,具体目标极不明确。

江西省犯罪学研究会会长、刑法和犯罪学教授李云龙认为,这些暴力案件的作案动机是因为某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产

生一种绝望心理,继而仇恨社会,并希望通过报复社会的方式来引起关注,或者泄愤。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心理测试技术专业导师组组长武伯欣曾就此类案件做过心理学分析,他说,袭击者的犯罪心理指向是泛化的、非特定的,具有个人恐怖主义的特征。这类恶性犯罪案件,往往是综合的社会矛盾在袭击者个人身上的反映,其行为、动机具有复合型的特征。

对他们来说,杀人不再是“冤有头,债有主”。

“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再发生如此悲剧,没有安全感,万一哪天挨着我们该怎么办?”爆炸案后,有厦门当地居民感到恐慌。

李云龙说:“(他们)杀人没有目的,没有说法就要有做法,就向社会公众报复。”这的确让人防不胜防。

自己让自己窒息

爆炸案嫌疑人陈水总的微博自诉浮出水面后,却意外地引发了民众对人性的检视。

在微博中,陈水总显得无奈和无助。他曾于1970年下乡,1983年返城后一家10口人挤着28平的房子。没有工作,直到40多岁才娶妻生子,多次摆摊维持生计,但摊位都被取缔,30多年一直生活贫困。

随着年龄增大,陈水总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苦熬至今60岁盼能办理退休,苟延残喘,万没想到户口当年迁移过程,派出所把年龄填写错误”,为此多处奔走,他认为各个部门互相推诿,“当官一张嘴,草民跑断腿”,这令他绝望,“家无余粮,绝望中祈求别人能给他活路。”

“悲惨”的人生境遇一度引

起公众对陈水总的同情,“这个绝对底层人士在被各个政府机关踢了几个月皮球,惨遭戏弄之后,疯狂地报复了社会。我要说,这就是我们为漠视付出的代价,这就是我们不把另外一部分人当作人付出的代价。”有网友说。

不少人反思制造社会报复者的社会土壤,但邻居的描述,无不指向了陈水总偏执的个性。

邻居反映,陈水总很少与他们搭话,而一开口,十次有九次是跟人吵架。8年前搬来局口街与陈水总作邻居的快餐店老板杨丹(化名)说,陈水总老抱怨快餐店太吵,占道经营,曾经一天打9次110投诉,甚至还装上铁门,把快餐店和他家之间的通道堵死。

陈水总的古怪、刻板让邻居们敬而远之,总怕他那天性情大变又发飙,“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街坊们说。

封闭的生活也让邻居们对他

(上接B01版)

“社监委16位委员不听从红会,是松散群体,是独立的非注册机构。我们没有人是靠红会吃饭的,也不会因为红会领导一句话就要为其做什么。我们不是接受命令,而是提出建议。”袁岳在接受采访时说。

但实际情况是,这个成立之初带着“代表公众监督红会”初衷、承载公众期望的第三方监督机构,此时整齐划一地令行禁止、三缄其口。

直到周筱赅密集出招,几乎“每天一帖”,指王永、王振耀、袁岳、张勇、金锦萍、邓国胜、郑静晨、黄伟民、吕红兵9人皆与红会有关联,并给他们一一扣上“红会卧底”的称号。

城门失火,殃及自身,原本去监督别人的人,现在也被人监督,委员们只能先自洗清白。

王振耀在微博回应,“从美

国回来,第一个礼物就是有人以记者名义编造谎言说研究院收到红会2000万捐款!看来当务之急是找这位所谓的‘记者’先生讨还从天而降的2000万捐款。”

袁岳称,尽管所在的公司为红会做项目评估只收取成本费,是公益服务,但网友却质疑其合理性。

被指为“第四位卧底”的北京红十字会蓝天救援队队长张勇也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回应质疑。作为社监委秘书长的黄伟民此前则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他对质疑不作回应,正忙着筹备年中会议。

与公众期待仍有差距

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是一个谁也没想到的结果,尤其是社监委的委员们,他们或许只想到

了开头,却没想到结局。

在“郭美美事件”之后,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决定成立社监委。成立之初,红会发出邀请,所邀请之人皆为社会精英,在其专业领域有所建树,且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如刘姝威即是著名的财务专家。

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些人在拥有影响力的同时,本身工作极其繁忙,有的委员根本无暇顾及社监委事务。

6月7日,在社监委年中会议召开前两天,齐鲁晚报记者致电社监委主任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得知其正在德国出差。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也极少出现在社监委的具体工作中。临近年中会议,还有几位委员也在出差。

其实两个月之前,在周筱赅还未质疑时,中国工程院院士、武警部队后勤部副部长兼武警总医院院长郑静晨就已提出辞职,并推荐另一位医疗界人士担任委员,理由即是“工作太忙,无暇顾及社监委工作”。

齐鲁晚报记者了解发现,在公开报道上看,大多数社监委委员都没有过多参与监督红会的工作,只有社监委新闻发言人王永代表社监委不断发声。

对于在专业领域各有建树的委员们,除了进行相关监督外,他们的另一项工作还在于发挥专长为红会的改革、发展提供建议和咨询,但他们目前的表现,与公众期待仍有较大差距。

“下一步到底要怎么走,相信很多委员都在思索。”王振耀在受访时表示,公众要求社监委

是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如果社监委真的如此定位,很多委员可能无法留任,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做。”王振耀说,社监委章程提出一年开两次大会,在时间上给予委员充分自由,他才愿意担任委员。

但在周筱赅提出质疑之前,无论委员还是公众,似乎都忘记了社监委这个“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的存在,社会精英依旧是精英,监督工作依旧接近于零。

面对自称爆料讲究“言必有据,一旦出手,从不失手”的周筱赅,部分委员采取了“守势”。王永、袁岳在回应质疑时均表示,如社监委认为有必要,将辞去委员一职。

直到周筱赅把这摊水“搅浑”。